

# 《毛泽东选集》著作编排与革命史叙事的经典化

黄江军

[摘要]《毛泽东选集》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形成的一部相当重要的文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之作。整部书的著作编排有着特定意涵。编辑者以时间顺序为著作编排的基本原则,兼以文章主题成组编排著作,并精心布局关键位置的篇目。《选集》的著作编排,其形式既遵循苏联出版的经典作家权威著作集的体例,亦追随中共此前文献编辑的经验,其内容则是已趋成熟的以毛泽东为中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叙事。《选集》与《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两种著述,一经一史互为支撑,共同建构出建国初期权威的革命史叙事。

[关键词]《毛泽东选集》;革命史;历史叙事;新民主主义;经典化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22)02-0036-14

以中共中央名义编辑的四卷本《毛泽东选集》,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形成的一部重要文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之作<sup>①</sup>。谓其重要,缘其是一个书写20世纪前半叶中共革命历程的特殊文本,亦因其同20世纪下半期中国政治与社会的数次转型高度相关,并持久影响到民众的阅读与精神世界。《选集》的经典化,可谓现代中国史上的“一大事因缘”。故其出版以来,时有学人向《选集》投注心力,考察其文本形塑与传播图景,进而揭示其经典化的动因。今堀诚二与马汉茂(Helmut Martin)皆注意到经典在中共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提出政治行动参与者持续从毛泽东著作中寻求正当性的现象<sup>②</sup>。更多的学人则将目光放在《选集》的文本层面。陈志让(Jerome Chen)概略地说明《选集》的文本基于编辑时的历史语境和文体改进的需要而出现的种种变化<sup>③</sup>。竹内实诸人更进一步广搜建国以前的毛泽东著作,对《选集》收录著作的前后版本进行细致校勘<sup>④</sup>。

前行论述虽就《选集》文本内容辨析甚精,却无视其著作编排这一偏于形式的面相。然循着返其旧心的思路可见,《选集》编辑者于此有相当严肃的考量<sup>⑤</sup>。下述信息同样提示,《选集》的著作编排意义非同寻常。其一,依《选集》自身的说法,这部书“按照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所经历

① 下文简称建国以后编辑的《毛泽东选集》为“《选集》”,1949年以前的十数种《毛泽东选集》则标注不同版本(如“晋冀鲁豫版《选集》”),以示区别。1949年以前《毛泽东选集》的版本与篇目信息,见黄江军:《中共执政以前毛泽东著作的经典化》,《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6期。

② 分见[日]今堀诚二:《中国革命と〈毛沢東選集〉の役割》,《中国の本質をみつめる》,勁草書房1985年版,第78~138页;Helmut Martin, *Cult and Canon: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State Maoism*, trans. by Michel Vale, Armonk: M. E. Sharpe, 1982。

③ See Jerome Chen ed., *Mao Papers: Anthology and Bibliograph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Introduction”。

④ 见[日]竹内实监修:《毛泽东集》10卷,苍苍社1983年版;《毛泽东集补卷》10卷,苍苍社1983至1986年版。

⑤ 毛泽东曾于1949年致电斯大林,阻止苏联翻译出版东北书店版《选集》,称其“在论文的选择方面和分类及次序排列方面均有缺点”。《选集》第1卷的《说明》,亦谓此前版本“体例颇为杂乱”。分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101页;《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本书出版的说明》,第1页。

的各个历史时期并且按照著作年月次序而编辑”<sup>①</sup>。不过，检核整部《选集》，年月次序的编排方法实际没有被严格遵循，每一卷都有例外<sup>②</sup>。这些例外，又非编辑者误排著作时间，而是基于其特殊的安排<sup>③</sup>。其二，较之此前问世的十余种《选集》，新版《选集》的编排体例独树一帜。亲闻《选集》编辑的黄洛峰即提示，“按照中国革命战争的各个不同的时期，以时期为经，以文章为纬编选”乃《选集》区别于旧版的一个特点<sup>④</sup>。此条史料关涉前述现象，其意涵值得进一步探究。其三，尤为重要者，《选集》划分的各个历史时期，表征着一套历史叙事。此一叙事之于中共革命和建国皆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数位先进已为此题拓荒，惜整部《选集》及其编排体例在其中有着更为关键的意义则尚未被郑重讨论<sup>⑤</sup>。

本文尝试考述《选集》著作编排体例及其负载革命史叙事的源流。首先梳理其编排体例的文本和思想渊源；继将《选集》置入中共革命史叙事的流变脉络中，解析建国初期经典生成与历史书写之间的关联；最后论述前揭“以时期为经，以文章为纬”这一《选集》编排原则的确切含义，进一步说明《选集》编辑者构造历史叙事的自觉意识。

## 一、《选集》著作编排体例的渊源

《选集》以时序为基础的著作编排体例，有两个直接的文本源头。

苏联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及斯大林等经典作家的权威著作集，在20世纪30年代已形成一定体例。除以时间为序编排著作外，尚有编辑说明、题解注释，及统一的装帧。《选集》的编辑者对此有充分认识<sup>⑥</sup>。从1930年代开始，中共即成规模地编译经典作家著作。抗日战争时期，延安解放社曾出版“两大丛书”与“两大选集”4类重点图书，其中3类为经典作家著作（即“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列宁选集》与《斯大林选集》）<sup>⑦</sup>。1949年，中共中央启动《选集》编辑

① 各个历史时期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毛泽东选集》第1卷，《本书出版的说明》，第2页。

② 有6处例外：《矛盾论》（1937年8月）先被放在第二卷卷末，1952年第一卷再版时被移入第一卷卷末，该文写作时间晚于第二卷卷首的《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1937年7月23日）；第三卷的开篇《〈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3月、4月），写作时间早于第二卷卷末的《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1941年5月8日）；《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附录于一年前的《学习与时局》（1944年4月12日）之后，期间的5篇著作都被置于《决议》之后；《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1945年4月27日）被放在《愚公移山》（1945年6月11日）一文之后；第四卷中，1946年11月18日的指示同1947年4月9日的通知放在一起，写作时间早于位列其前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1947年2月1日）一文；1948年10月10日的电报同1948年9月7日的电报合并，时间晚于位列其后的《关于健全党委制》（1948年9月20日）一文。

③ 1991年出版的《选集》修订本，订正了15篇著作的时间，但无一涉及前述著作。见冯蕙、汪裕尧、吴正裕、赵福亭：《〈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一版正文和题解的主要修订情况》，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编：《毛泽东著作是怎样编辑出版的》，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58页。

④ 《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黄洛峰在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第四次大会上的报告》（1949年10月5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1卷，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页。

⑤ 前行论述或自政治史角度考察这套叙事在延安时期的初步建构，或从史学史领域梳理中国近代史分期之形成，偏重于从毛泽东单篇著作中发掘其历史叙述。分见Tony Saich, “Writing or Rewriting Histor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aoist Revolution on Party History”, Tony Saich and Van de Ven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NY: M. E. Sharpe, 1995, pp. 299~338; [美]李怀印：《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岁有生、王传奇译，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77~136页；王也扬、赵庆云编：《当代中国近代史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8~40页。

⑥ 《选集》的核心编辑者为毛泽东、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四人。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3卷，第1101~1103页；刘金田、吴晓梅：《尘封：〈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台海出版社2012年版，第118~125页。

⑦ 胡永钦、耿睿勤、袁延恒：《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概述》，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0页。

之时，中央宣传部即设立《斯大林全集》翻译组，计划引入苏联版《斯大林全集》<sup>①</sup>。最终出版的《选集》，其编排方式与装帧都取法苏联出版的权威经典，而迥异于40年代编辑出版的绝大多数《选集》版本及此前其他毛泽东著作集。

苏联版经典著作提供了形式上的体例参考，《选集》具体的编排规则则源于中共自身的文本经验。其中至关重要的一项经验，恰来自《选集》编辑者不满的旧版《选集》中的一种。

1949年以前的十数版《选集》没有形成统一的编排体例，但不至于杂乱无章。几乎全部旧版《选集》均按著作主题编次。1944年的晋察冀日报社版，是首个正式出版的《选集》版本，开以专题编排《选集》的先河。该版编辑者自道：“全书按内容分编为五卷：第一卷包括5篇著作，为国家与革命问题的论著；第二卷11篇，为统一战线问题的论著；第三卷3篇，为战争与军事问题的论著；第四卷3篇，为财政经济问题的论著；第五卷7篇，为党的建设问题的论著。”<sup>②</sup>此后十余个版本的《选集》，编辑者虽不同，分卷主题却与此基本一致。仅有的例外乃出版时间较晚（1948年）的晋冀鲁豫版《选集》。这部《选集》共收录著作61篇，为旧有诸版《选集》收文最多者。全书著作按时序编排，且被划为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抗战以来三个时段。此一独特的版本，正是新版《选集》编排的重要参考。

《选集》编辑者确曾使用过晋冀鲁豫版<sup>③</sup>。如下现象，也证明《选集》的编排受到晋冀鲁豫版的影响。

其一，全部旧版《选集》中，晋冀鲁豫版不仅唯一按时间顺序编排著作，而且著作的时序结构同新版《选集》十分接近。晋冀鲁豫版收文范围与其余版本有更大的差异，结构则更为严整。晋冀鲁豫版收录的《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及其后3篇著作，均为其他版本所无，而这数篇著作恰处于新版《选集》第二卷的结尾；晋冀鲁豫版收录的《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亦为其他版本所无，而此篇著作正是新版《选集》第三卷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终篇；有两个版本收录抗战结束以后的3篇著作，而文献条件不会更差的晋冀鲁豫版却没有收入此后的任何著作。可以说，晋冀鲁豫版的编辑者对毛泽东著作已有极精细的历史分期意识。晋冀鲁豫版既已形成较严整的毛泽东著作分期，且新版《选集》的编辑者确使用过这一底本，因而后者的编排受到前者的影响有事实和逻辑的基础。

其二，晋冀鲁豫版收录的著作及其编排受到《两条路线》的影响。晋冀鲁豫版的编辑者曾明确提及该版的编辑参考过《六大以来》《两条路线》等“党书”<sup>④</sup>。其编排更明显取法于《两条路线》。

《六大以来》《六大以来选集》《六大以前》《两条路线》四部“党书”，虽均以时间为序，却有所差别。《六大以来》以专题分类，各专题中的著作以时间为序。《六大以来选集》《六大以前》虽按时间排序，却没有明确的分期。最晚成书的《两条路线》则不同，全书137篇著作分别被编入“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抗战时期”三个时段。晋冀鲁豫版以“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抗战以来”分期，显然直接因袭自《两条路线》。

① 《中央编译局五十年（1953-2003）》，内部印制，第4页；顾锦屏、陈聪执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工作六十年》，俞可平主编：《马列经典在中国六十年：中央编译局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文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② 沈达、曹国辉：《邓拓要我们印好〈毛泽东选集〉》（1985年12月），刘金田、吴晓梅：《尘封：〈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第186页。

③ 见冯蕙、汪裕尧、吴正裕、赵福亭：《〈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一版正文和题解的主要修订情况》，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编：《毛泽东著作是怎样编辑出版的》，第63、76、86-87、92页。

④ 《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出版〈毛泽东选集〉的一些回忆——访张磐石》，刘金田、吴晓梅：《尘封：〈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第195、200页。

以上几部“党书”均为毛泽东亲自选编,《两条路线》更是政治性最强的一部。胡乔木就提到,《两条路线》是在《六大以来》等基础上编辑而成,更说“《两条路线》的编出,使整风更加深入了”,“到编辑《两条路线》时就完全是政治性的了。这时两条路线已划分清楚,中央的认识也基本统一了,从而选哪些文章作为代表作也就清楚了。编辑《六大以来》时还不可能。”<sup>①</sup>随着整风深入与认识清晰,毛泽东一改前几部“党书”的体例,将《两条路线》的著作划为三个历史时期,进而初步建构起一条革命史的叙事线索。晋冀鲁豫版《选集》的编辑者可谓深知其意,将《两条路线》的编排原则做了更完整和严密的发挥。《两条路线》收录著作时间截止于1943年10月,晋冀鲁豫版《选集》收录此后的数篇著作,并严格以抗战结束的时间为收文截止时间。即便新版《选集》的编辑者无视晋冀鲁豫版的编排方式,也不会不想到《两条路线》的编辑思路。

简言之,晋冀鲁豫版《选集》与《两条路线》的著作编排是苏联版权威经典之外,新版《选集》编辑者的又一重要参考。值得注意的是,《选集》编辑者参考其著作编排的同时,亦对其负载的历史叙事有深度自觉。这即是说,中共革命史叙事的渐趋成熟及其居党内政治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是构造《选集》编排方式的思想动因。

学术先进已揭示,清末民初,史学的地位伴随着经学的衰微而不断提升。罗志田即谓,史学“以荣其国家,以华其祖宗”的功能,与源出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想恰相通,这使得史学在近代被提到关乎国家与文化存亡的高度,“实即取代了经学过去曾被赋予而在近代已无力承担的社会角色”<sup>②</sup>。王汎森亦注意到,晚清以来的思想界中,“未来”变得至为重要,且因律则化史学的深入人心而使人相信“未来”是可知的或已知的。彼时,史学被当作寻找新“大经大法”的资具,“史学成为一种新‘经’”<sup>③</sup>。史学地位的提升与律则化史学的兴起,为此后中共的历史叙事埋下伏笔。

到1930年代初,救亡图存的现实要求重新高扬,积淀数十年的苏俄意识形态亦随之凸显,中国思想界遂从中西对峙“道出于二”转变为一中一西一俄的“道出于三”局面<sup>④</sup>。现实困境与新的意识形态共同刺激,使得史学的地位再度得到抬升。其时的社会史论战,即是一大表征。社会史论战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高度律则化的历史哲学)的兴起为背景,其议题既指向古代又涉及当下的中国社会性质,是以史学论辩形式出现的政治道路论争<sup>⑤</sup>。自此,马克思主义化的历史叙事声势渐隆,终在1930年代末成为论述中共革命的重要思想资源<sup>⑥</sup>。

与此同时,借重历史寻求执政正当性的政治文化在苏联逐渐形成,进而影响到中共。斯大林执政后,逐步掌握联共(布)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并策划编写党史教科书。经过数年酝酿、数月编写,在斯大林主持下,《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下简称《教程》)于1938年10月正式出版<sup>⑦</sup>。

不到一年时间,《教程》就陆续于重庆、延安等地发行中译本,其后成为中共历史叙事的蓝本。其中的三种叙事影响尤巨。其一,人类历史的五种基本社会形态。社会形态是历史唯物主义

①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0~51页。

② 罗志田:《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汉学研究》1997年第2期。

③ 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中的“未来”》,收入《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50~256页。

④ 罗志田:《道出于三:西方在中国的再次分裂及其影响》,《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⑤ 唐红丽:《“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再回眸——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越》,《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2月4日,第A04版。

⑥ [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1~217页。

⑦ [俄]罗伊·梅德维杰夫:《斯大林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俄罗斯学刊》2015年第2期。

的主干思想,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叙事,为社会主义革命提供正当性。其二,重视路线斗争的历史叙事,且斯大林处于正确路线的中心地位。联共(布)党内始终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是贯穿全书的基本线索,而历次斗争中,只有斯大林坚持列宁的无产阶级路线。这为斯大林的领袖地位及其理论家身份提供了强有力的话语支撑<sup>①</sup>。其三,提炼斯大林主义的核心思想。全书以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作结,涵括批评和自我批评与无产阶级政党专政、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纯粹的工人阶级、清除异己分子、密切联系群众几个方面<sup>②</sup>。

1939年下半年,毛泽东和党内其他几位执笔人共同写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系统阐述中国社会的性质及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和性质等诸问题。该文关于中国自周秦以来进入封建社会、现代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封建半封建社会性质等论断,是其后中国古代史及近代史叙事的权威源头。此前,中共党内已有数种党史报告和读本,除张闻天撰写的《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持续发挥影响外,其余撰述鲜为人知<sup>③</sup>。更大范围的左翼历史读物,此前亦较缺乏。经毛泽东倡导并提供一套表述,相关著述方于1940年代勃兴。范文澜及其他一批左翼史家的史学著作,对普通读者的人生观和政治选择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阶级斗争与共产革命方成“正义的合理行为”<sup>④</sup>。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资源,正与前述社会史论战、《教程》及下文将要论述的张闻天的著述有关。王学文、何干之这两位社会史论战的主将可能参与到该书的写作,而五种社会形态则为毛泽东论述中国历史与社会性质提供直接的理论依据<sup>⑤</sup>。毛泽东在该文中首次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并在随后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加以阐发。他认为,鸦片战争以降,中国人民即开启民主革命历程,不过由于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以及社会主义世界革命时代的到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交由无产阶级领导,下一步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得以创造条件。建立这一理论的思想资源,不再单纯依赖阶级分析,而特别倚重历史叙事。

继新民主主义论对外解答中共革命正当性的问题而来,其后的整风运动着力解决党内领导权和思想统一的问题。毛泽东的数篇讲话和由其主编的几部“党书”是推动整风运动的关键文献。数部“党书”中,《六大以来》及其选集本最早成书。编辑过程中,毛泽东逐渐形成“解决政治路线问题”的编辑目的<sup>⑥</sup>。这一意识的源头正是《教程》,其后则益愈明确。《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相继被编出。《两条路线》更是清晰地使用历史分期来编排著作,揭示以毛泽东为正确代表的党史路线。

“党书”形式上只是文献集,其历史叙事的清晰、路线评价的权威、思想理念的水准,乃至传播范围,均不及《教程》。因之,编辑“党书”之初,毛泽东就计划撰写叙述更为清晰且经过中央认定的权威党史文件<sup>⑦</sup>。经过全党整风,党内思想得到整合,决议历史问题的条件渐趋成熟。1944年3月5日、4月12日和5月20日,毛泽东先后发表关于路线学习的六条意见和《学习与时

① 王也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与延安整风》,《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2017年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55~59页。

② 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38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8-1943》,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613~624页。

③ 这些党史报告多数由党内领导人执笔。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④ 李孝迁:《革命与历史:中国左派历史读物》,《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5期;李孝迁:《“红色史学”: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新论》,《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11期。

⑤ 冯天瑜:《“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42~356页。

⑥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第48、175~176页。

⑦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第212、215页。

局》的报告。这些讲话成为起草历史决议的指导原则<sup>①</sup>。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经过数次修改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于1945年4月20日提交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获原则通过。1945年8月9日，再次修改后的决议于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重新通过，并于8月12日正式印成党内文件。

《决议》形成过程本身就说明，毛泽东将历史叙事视为要紧之事。具体到决议文本，则确认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以及毛泽东的领导地位<sup>②</sup>。与《教程》相比，由于当时“毛泽东思想”的内涵尚未被明确，决议没有提炼出类似前者结束语那样的精练话语（195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始对中共党史作了类似的提炼）。

最晚到1950年8月19日，毛泽东已考虑将《决议》编入《选集》。这一做法同样受到苏联的影响。《斯大林全集》于1946年出版第一卷，编辑者在“出版序言”中提及，这套著作集计划出版十六卷，第十五卷将收入《教程》<sup>③</sup>。尽管中译本《斯大林全集》要到1953年才出版第一卷，但其翻译工作早在建国以前即启动。毛泽东也于1951年4月致信斯大林，请其准许中方编辑出版《斯大林全集》中译本并为中方提供必要帮助<sup>④</sup>。最终，因苏联版《斯大林全集》只出到第十三卷，《教程》无缘收录其中。《决议》则附录于《选集》第三卷《学习与时局》一文之后。

中共革命史叙事的形成过程及《决议》被再次修改后收入《选集》，均表明毛泽东高度自觉于构造权威的历史叙事。到建国之时，以毛泽东为中心的党史叙事和以中共为中心的革命史叙事均已成熟，新版《选集》以时间为序来编排著作即势所必然。

## 二、《选集》分期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叙事的经典化

历史叙事既被视为要紧之事，故中共建国之初就着力于重建民众的历史观念。《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撰写与《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就是新中国最具权威的重构历史叙事的行动。前者乃有意识地提供一套以毛泽东为中心的革命史叙事已无需赘言<sup>⑤</sup>；后者为达成同样目标，不仅以时间线索编排著作，更选择具有特定意义的历史分期。同以时序编排著作一样，《选集》呈现的具体历史分期，亦有着早期的文本经验。

清末民国时期革命史叙事的凸显，可谓前述律则化史学兴起的最为典型的一个表征。一方面，革命史的目标因革命的现实要求而明确指向未来，另一方面，革命史的律则性极强，且因革命的不同理解而呈现不同的律则。王先明注意到，在中共革命史兴起之前，革命史即已形成并建构了自己的统系。就革命实践过程言，以孙中山事迹为主线，形成革命史的基本框架，直至将国民党史、革命史、民国史统合为一体；从革命话语塑造看，围绕革命史分期至少存在民族革命、国民革命、阶级革命的不同看法，同时，存在着以革命史重构中国近代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取

①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第306~307页。

② Tony Saich, "Writing or Rewriting Histor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aoist Revolution on Party History", Tony Saich and Van de Ven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p. 328.

③ Институт Маркса-Энгельса-Ленина при ЦК ВКП(б), И. В. Сталин Сочинения.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46. Т.1, С. VIII.

④ 毛泽东：《为翻译〈斯大林全集〉给斯大林的电报》（1951年4月7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27页。

⑤ 《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写作经过，见《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传》上卷，当代中国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84~193页。《胡乔木传》如是总结这本书的特点，“结合党的历史讲了毛泽东思想是怎样形成的，是如何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毛泽东是怎样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领袖的；回答了中国革命怎样从失败中找到了胜利的道路、找到了自己的领袖”。《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传》上卷，第192页。

向<sup>①</sup>。这些革命史的基本模式，在其后的中共革命史中得到相当程度的继承。

前已提及，30年代中期及以前，中共党内已有数种党史撰述。这些撰述基本没有明确的历史分期，缺乏一以贯之的叙事线索。倒是少数几种革命史著述，虽同样没有强调历史分期，却有意拈出近代历史的大事件。恽代英的《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可引为典型。该书初版于1927年，共7讲，围绕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康梁变法、义和团和八国联军、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铺陈叙事。与当时同类革命史著述相比，该书较早以整个中国近代历史为叙事范围；与同期的中国近代史著述相比，该书则是以革命史为叙事线索的早期作品<sup>②</sup>。同前述党史撰述有别，这些革命史著述公开发行并数次重印，实际参与到当时整个革命史、中国近代史学科以及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之中。这类著述尚未强调中共革命的重要性，其律则性亦不甚显著。

以中国现代史研究委员会名义编著，实由张闻天主笔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是延安初期出自中共领袖的最成熟的革命史著述。该书成于1937年前后，脱胎于1934年印行的《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在《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中，张闻天首先分析了中国社会已成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经济性质，进而称此种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与消灭封建势力的资产阶级性的革命”<sup>③</sup>。《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一书，径以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戊戌政变与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与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国国民党的改组与国共合作、1925至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为各章题目。与此前同类著述相比，该书凸显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

此书影响极大。从近处看，自此书出版到中共执政，根据地的各类学校，相关课程都以其为教材，范文澜等人的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著作，亦参考过此书<sup>④</sup>。从远处说，该书构成此后革命史叙事及整个中国近代史书写的一个重要基因。若以后来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之分亦即通行的中国近代史下限为标准，《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于近代史部分只述太平天国运动、戊戌政变与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三段。胡绳于1954年提出近代史的“三大革命高潮”说，与此完全相同<sup>⑤</sup>。虽难说胡绳之见一定来自此书，但张氏之书对胡氏之说作了思想铺垫进而使得其说广被采纳却是可信的。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阐述的相关论断，其思想资源和论证模式亦于张闻天这里表出先声。两文中，毛泽东两次历数中国近代的重大事件。前文提到，“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直至现代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不断的反抗精神。”<sup>⑥</sup>后文谈及，民主主义革命“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即中国社会开始由封建社会改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就开始了的。中经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一二九’运动，直到今天的抗日战争”<sup>⑦</sup>。两文论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七个重大事件，正

① 王先明：《关于革命史的形成、建构与转向的历史思考——兼论“新革命史”问题》，《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6期。

② 周一平：《中共党史史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0~71页；王也扬、赵庆云编：《当代中国近代史理论研究》，第18页。

③ 张闻天：《中国革命基本问题》（1934年），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378页。

④ 程中原：《张闻天传（修订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版，第284页。

⑤ 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赵庆云考证，胡绳之说直接受到张书影响。见赵庆云：《“三次革命高潮”解析》，《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6期。

⑥ 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第5期（1940年4月25日），第2页。

⑦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创刊号（1940年2月15日），第4页。

是此后中国近代史主线的一种标准说法。

与此前仅叙历史事件的著述不同,《新民主主义论》更从“文化革命的统一战线”角度,给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划定最初的分期:1919到1921年,以五四运动为主要标志;1921到1927年,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五卅运动、北伐战争为标志;1927到1937年,为新的革命时期;1937年以后,为抗日战争时期<sup>①</sup>。这四个分期奠定其后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叙事的基本框架。

历史分期及其名称是一种历史叙事最显著的表征,划分历史时期并命名往往意味着某种历史叙事趋于成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共革命史较此前的革命史有着更浓烈的律则性,且与之截然有别。毛泽东在初步提出不够满意的党史分期后,继续斟酌这一问题。1942年,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讲话,再次提及中共历史的分期问题:“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我们党的历史,我觉得可以分为这样3个阶段:大革命时期是第1个阶段;内战时期是第2个阶段;抗日战争时期是第3个阶段。这个分法是否妥当,大家可以讨论,我只是作为一个意见提出的,不是中央的决议。如果有更适合党的历史过程的分法更好。”<sup>②</sup>

尽管这不是“中央的决议”,却已有相当权威。次年,毛泽东编辑《两条路线》时,采纳的就是这一说法。再过两年,这一分期终成中共中央的决议,仅第二个时期的名称由“内战时期”变更为“土地革命时期”。

但这一分期之说没有很快铺开为中共党史的通行表述,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和解放战争的展开,新的历史时期的命名也众说纷纭。1948年晋冀鲁豫版《选集》的分期,袭用中央书记处编辑的《两条路线》,而不同于中央全会通过的《决议》。黄祖英等人编著的《近百年史话》用一章概述旧民主主义革命,接下来五章依次述及五四运动、1925至1927年的大革命、十年苏维埃运动、八年抗日战争及人民革命战争<sup>③</sup>。陶官云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话》则以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从“九一八”到“七七”、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爱国自卫出发的人民革命战争划分中共革命的各个时期<sup>④</sup>。这两种著作都是中共执政前夕的畅销书,分期与命名则并未统一。

中共内部的党史分期与命名的统一,于1950年前后展开,经《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与《选集》的权威确认,随即定型。1949年5月,华北大学印制胡华编著的《中国近代革命史讲话初稿》一书。该书分三编,各编命名为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开端与大革命时期、中国人民十年土地革命时期,其分期和命名较前述诸种著述又略有不同。1950年3月,胡华在此前讲稿的基础上撰写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一书出版。此书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期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sup>⑤</sup>。胡华新著的历史分期和命名极为整齐,与一年前的讲稿很不一样,而同其后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和《选集》几乎一致。目前能找到两种比胡著稍早或同时使用相同分期与命名的著述。较早者为沙平发表于《人民日报》的文章:“在中国共产党产生以后,中国人民曾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举行了四次革命战争,其中三次是国内战争,一次是抗日民族战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发生于1925年至1927年,结果是失败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发生于1928年至1936年,结果大部分也失败了。在1937年至1945年的八年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间,中国人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创刊号(1940年2月15日),第20页。

②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3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页。

③ 黄祖英、沈长洪、陈怀白编:《近百年史话》,华东新华书店1948年版。

④ 陶官云:《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话》,光华书店1949年版。

⑤ 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新华书店1950年版。

民在广大的范围内得到了并且保持了自己的胜利。然后,在这一次的由1946年开始的革命战争中间,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事业才得到了现在这样的成功,并即将得到最后的成功。”<sup>①</sup>作者先总叙四次革命战争的两种类型,然后予以分述。这一表述方式提示着,该文是较早提出此一严整命名的著述。

稍晚者为出版于1950年5月的廖盖隆撰《新中国是怎样诞生的》一书。该书的分期与命名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1924至1927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1927至1937年)、抗日民族革命战争(1937至1945年)、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1945至1949年)<sup>②</sup>。

上述三种著述极可能存有关联。沙平是笔名。胡愈之长期于东南亚地区从事出版业,用此笔名发表过不少有关该地区的文章<sup>③</sup>。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数年,胡愈之与廖盖隆皆在宣传部门工作,职位相近,有共享的信息渠道。廖著很可能直接吸收了沙文的观点。胡华一书则有两种可能的来源。一是沙平的文章。廖著与沙文均称“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胡书则谓“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稍有不同。另一种可能是给胡华著作提供修改意见的诸人。胡书写作中得到胡绳、叶蠖生的意见<sup>④</sup>。而胡绳、叶蠖生两人当时正与胡愈之同在出版总署任职。该书完稿后,随即送中央宣传部审定,胡乔木、田家英、邓拓等均提供建议<sup>⑤</sup>。

无论胡华一书的历史分期与命名是否来自前述诸人,亦无论胡华、廖盖隆甚或胡愈之著述中的相关表述是否共享更早的权威来源,但都可肯定,胡乔木、田家英等《选集》的核心编者于1950年3月前后已认知到相当严整的中共党史分期与命名。不过此一表述彼时还未被权威认定,故仍有一些著述使用着杂乱的分期名称<sup>⑥</sup>。

一年后,由毛泽东提议、胡乔木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出版。该书将中共党史分为“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1至1927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至1936年)”“抗日战争时期(1937至1945年)”“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经济恢复时期(1945年以来)”四个阶段<sup>⑦</sup>。几个月后出版的《选集》遂完全取用此说。《选集》的编排接榫于《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分期,两者相互配合,形成经典文本与历史叙事相互印证的经史互证格局<sup>⑧</sup>。两者被广泛传播,共同塑造新的权威革命史叙事。

其后的中共革命史及整个中国近代史的叙事皆本于此。前述韦力、胡华两书的修订本均据《选集》的分期命名做出改动。韦书的“再版声明”说:“这版作了稍许的修改,特别是把革命几个阶段的名称统一了,前一版是沿用过去习惯的名称。”<sup>⑨</sup>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到1953年初已出至第十一版。该书分期与命名本就极为严整,然新版的章节标题仍尽依《选集》

① 沙平:《印尼事变的教训(续完)》,《人民日报》1949年3月26日,第3版。

② 廖盖隆:《新中国是怎样诞生的》,海燕书店1950年版。

③ 见胡愈之:《胡愈之文集》第5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该卷收入胡愈之1947年到1961年的文章,但无《印尼事变的教训》一文。

④ 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前言”,第2页。

⑤ 刘涓迅:《革命史家胡华》,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版,第83页。

⑥ 如《中国革命初级读本》仍以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等命名。韦力:《中国革命初级读本》,东北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

⑦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人民日报》1951年6月22日,第5、6、8版。

⑧ 两者在其后长时期内往往被有意识地合并阅读。如华北局就曾发文,县以上干部学习党史,以《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为纲,重点学习《选集》;田家英在宣讲如何学习《选集》时,首先就推荐阅读胡乔木此书,以“熟悉当时的历史情况”。分见华北局宣传部:《1952年学习党史必须学习的毛主席著作目录》(1952年5月21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12-00093;田家英:《〈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内容介绍》,力平、何建东、梁进珍编:《田家英谈毛泽东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其时及其后,关于《选集》的经典定位及其与《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形成经史互证关系的表述还有很多,详另文。

⑨ 韦力:《中国革命初学读本》第2版,东北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再版声明”,第1页。

改动数处。胡华在修订后记中明言：“尤其是去年6月以来，胡乔木同志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和《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卷的先后出版，使本书的修订更加有了依据。”<sup>①</sup>

新出版的同类著述亦使用《选集》的历史分期。如荣孟源的《中国近百年革命史略》、何干之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初稿》，等等<sup>②</sup>。1954年，正值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热烈之际，涉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分期问题却鲜有人论。从目前仅见专门讨论这一问题的顾林一文可知悉，当时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分期的分歧远不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段“严重”。作者先是明确与《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相同的分期和名称；再表示应该慎重选择参考书，“毛主席著作中的指示是我们最主要的根据，胡乔木同志所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也应该作为准备课堂教学的主要读物。……我们现在所谈的分期、分段问题便应该从这些著作、文献中去明确”<sup>③</sup>。实际上，当时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包括以古史为主的“五朵金花”的讨论）虽较热烈，其底线却也没有越出毛泽东的相关论述。

有经典论述确认，相关著述接纳，学术讨论推动，则此套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叙事纳入教科书，以实现更广泛的和组织化的历史观念的重塑就不仅是势所必然，更是顺理成章<sup>④</sup>。《选集》和《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奠定的历史叙事，特别是中国近代史、革命史叙事自此影响深远。

### 三、《选集》编排体例的完整含义

《选集》择时间顺序为编排著作的体例，以提供一套全新的革命史叙事。那么，前揭数篇著作未按时间顺序编排，当如何解释？黄洛峰所说的“以时期为经，以文章为纬”的确切含义又该如何理解？

前揭数篇著作未按时间顺序编排，各有具体原因。《矛盾论》与《实践论》创作时间有先后，却同属《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书的章节。故《选集》再版时，将《矛盾论》移至《实践论》下，而不是据写作时间放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之后。《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与《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两文同为回应皖南事变的著作，故编辑者没有按时间顺序将该文放在第三卷。因《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本精神和起草安排皆基于《学习和时局》中的两篇报告，编辑者也没有按时间编排。《愚公移山》为七大闭幕词，与《两个中国之命运》《论联合政府》同涉中共七大，故编辑者再次打破时间顺序，将该文编于《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一文前。1946年11月18日的指示同1947年4月9日的通知都谈及中共放弃延安的战略及其部署问题，故编辑者将两文合并一处，写作时间处于两者之间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一文反居其前。这些“例外”可归结为一个因素，即相关著作涉及同一事件或相同主题。这提示着，编辑者自觉将《选集》著作进行成组编排。

《选集》中的另一现象，也与此有关。绝大部分著作都以其初始规模被《选集》收录，少数著作却经过拆分或合并后编进该书：《实践论》和《矛盾论》拆分自《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

① 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修订本）第11版，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69页。

② 荣孟源：《中国近百年革命史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4年版；何干之主编：《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初稿）》，高等教育出版社1954年版。

③ 顾林：《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分期分段问题》，《历史教学》1954年第9期。

④ 《小学历史教学大纲（草案）》（1956年），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历史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尤其第109~128页。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合二为一,《学习和时局》是两个报告的整理稿,《中共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包括不同日期的两个文件,《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与《战争和战略问题》同为六届六中全会上的结论,《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亦含两篇著作。编辑者合并、拆分著作的直接目的,是归并同类或细化不同主题的著作。此一目的,实与前揭有悖时间顺序去编排著作的意图吻合,同样说明编辑者有意识地于时间顺序外以著作主题为单位成组编排著作。

打破时间顺序、合并或拆分,均是成组编排著作的鲜明呈现。实则成组编排著作乃一条隐而不彰却贯穿整部《选集》的基本原则。《选集》的核心编辑者之一田家英,对此即有不少表述<sup>①</sup>。这些《选集》出版后的表述,间接呈现着编辑时的考量,更直接再生产着《选集》的历史叙事。

《选集》第一卷中,《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两文的主题被编辑者概括为答复大革命失败后红军和红色政权能否存在和发展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理论问题”<sup>②</sup>。第二卷中,《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论政策》《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等著作,共同呈现抗战期间中共实施统一战线“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sup>③</sup>。

第三卷中,《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被视为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则是领导解放区生产运动的“基本纲领”<sup>④</sup>。整个第三卷,涉及整风与生产两大运动的著作被大量收入且被重点推介。这与编辑者对全卷著作主题的安排相关。田家英曾提及,整风运动是第三卷的一个主要问题,“作用最大,其他各个问题都与整风运动有联系”<sup>⑤</sup>。吴冷西也有类似回忆,认为田家英将第三卷归纳为整风运动、生产运动两大问题,“真是领会透彻,抓住要害”<sup>⑥</sup>。

第四卷中,《将革命进行到底》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表的对于时局的声明和为新华社写的《评战犯求和》等一系列评论,被归纳为“在人民面前彻底地揭穿了国民党反对派利用和平谈判来保存实力的真相,扫除了右翼资产阶级散播的反动政治影响,争取革命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的彻底的胜利”的叙事<sup>⑦</sup>。这些评论被收入《选集》,乃毛泽东亲自圈选<sup>⑧</sup>。田家英的表述无疑是对这些著作进行再历史化的产物。田氏在另一处分析《选集》第四卷著作的分期,同样说明编辑者于此有相当自觉。其谓,第四卷的著作可分为四组,而四组著作恰与“革命和反革命两种力量最后决战”的四个时期一一对应<sup>⑨</sup>。

类似被编辑者成组编排且提炼主题的著作,各卷尚有数十篇。这些著作中,多数成组的著作均被编排在一起。这意味着一组著作中间的其他主题相异的毛泽东著作没有被《选集》收录,

① 其表述主要见于《选集》四卷出版时的介绍、《选集》学习会的讲稿。《选集》各卷出版时的介绍均由田家英主笔,以新华社名义于发行首日在《人民日报》头版登载。见逢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1989年7月)、吴冷西:《同家英共事的日子》(1996年4月4日),董边、谭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辽宁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3、98~99页。此外,《选集》各篇的题解、《选集》出版后发行的著作汇编本,亦多少表现着成组编排的考量。

② 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人民日报》1951年10月12日,第1版。

③ 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出版》,《人民日报》1952年4月10日,第1版。

④ 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出版》,《人民日报》1953年4月10日,第1版。

⑤ 田家英:《〈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内容介绍》,力平、何建东、梁进珍编:《田家英谈毛泽东思想》,第31页。

⑥ 吴冷西:《同家英共事的日子》(1996年4月4日),董边、谭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99页。

⑦ 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人民日报》1960年9月30日,第1版。

⑧ 毛泽东:《给田家英的信》(1960年3月2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7页。

⑨ 见田家英:《〈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内容介绍》,力平、何建东、梁进珍编:《田家英谈毛泽东思想》,第56~58页。

《选集》所呈现的历史叙事并非处于一个匀质的时间序列<sup>①</sup>。少数分散各处的著作被编辑者视为成组，则说明某一议题被作者持久关注。为此，编辑者以题解或介绍等方式，将其连接起来。无论是否打破时间顺序，成组编排著作确是《选集》编排著作的一个重要规则。成组编排与时序编排并不矛盾，相反，将一些时刻和思想主题凸显出来，使事件进程和思想脉络更为清晰，进而使编辑者意欲呈现的历史叙事变得丰满且更具内在合理性。本文认为，此即前揭黄洛峰称《选集》“以时期为经，以文章为纬”编排著作的完整含义。

《选集》编排的特殊考量，还见于《选集》全书、各卷及各个时期起终著作的布局。此点编辑者未予明示，却也有迹可循。田家英在1960年代编辑另两种毛泽东著作集时，即对其首尾著作有深思熟虑<sup>②</sup>。结合《选集》文本与编辑者认定的重点著作看，《选集》一至四卷的首末篇著作都基于编辑者的精心编排<sup>③</sup>。

整部《选集》的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编辑者在介绍该文时称：“这篇文章已形成了关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思想。”<sup>④</sup>此文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澄清中国革命的动力与对象，此后成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被视为此种思想的推进。实际上，此文出版之初较有影响，其后则长期淡出视野（十余种旧版《选集》无一收录此文）。与影响更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相较，该文更契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叙事，创作时间更早、方法论意义更重。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开篇《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编辑者认为，以武装斗争为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以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的革命方针、革命区域的扩大应该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都于此文得到确认<sup>⑤</sup>。这一表述于中共革命史叙事至关重要。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有别于此前同国民党合作的国民革命，亦不同于此前以城市为中心开展的工人运动，是中共革命道路的重大转型。这一解说传递的信息是，推动中共革命道路转型的核心人物正是毛泽东。

第一卷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末篇《实践论》《矛盾论》。《矛盾论》没有按时间顺序排入第二卷第二篇，既有该文与《实践论》本属一书的原因，又基于强化第一卷理论性质的考量。

第二卷亦即抗日战争时期的开篇《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编辑者谓，两文在抗日战争初期即注意到国共两党关于抗战的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而这两条路线“贯穿于整整八年时间的抗日战争的过程中”<sup>⑥</sup>。该卷结尾的数篇著作（涉及皖南事变），恰回扣着这一主题。

第三卷的开篇《〈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编辑者打破时序，将该文置于第三卷卷首，强化前述第三卷以整风运动为中心的叙事。《农村调查》全书不是整风的核心文献，却与整风运动密

① 《选集》选收著作时所作的取舍，同样基于编辑者的严肃考虑。取舍与编排的考量不尽一致，但关系密切，详另文。

② 此两种著作作为《毛泽东著作选读》甲、乙种本与《选集》第五卷，其重要性仅次于《毛泽东选集》前四卷。见《田家英在〈毛泽东著作选读〉出版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65年1月14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13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59页；吴冷西：《同家英共事的日子》（1996年4月4日），董边、谭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128~129页。

③ 《毛泽东选集》四卷篇幅有不小差异（各有326、459、331、398页），或显示编辑者凸显各卷首末篇目与关键历史时刻的意识强于追求篇幅均衡的意识。

④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人民日报》1951年10月12日，第1版。

⑤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人民日报》1951年10月12日，第1版。

⑥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出版》，《人民日报》1952年4月10日，第1版。

切相关。《选集》收录的一序，曾被确定为整风运动的必读文献，流播甚广。

第三卷的结尾《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此文初版于1945年8月10日的《解放日报》，各种版本并无固定题目。晋冀鲁豫版《选集》题名《关于抗战最后阶段的声明》，《选集》选收此文并改题，以更有力地宣告抗日战争时期的结束。

第四卷也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开篇《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编辑者提及，“这篇讲演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深刻地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势，并且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sup>①</sup>。此文与前三卷开篇著作的意义一致，均呈现作者在各个历史时期之初即已洞察时势，并提出决胜之策。不惟著作编排，部分《选集》收录的著作题名及题解，均反复彰显毛泽东对中国革命进程所作的科学预见<sup>②</sup>。

整部《选集》的结尾：“评白皮书”的五篇著作。编辑者自道，“在这些评论里，毛泽东同志还批评了对于中国革命的唯心主义的解释，对中国近代革命的发生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作了理论上的说明”<sup>③</sup>。其中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毛泽东借批驳艾奇逊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数条看法，申说其已经相当成熟的历史叙事。该文原题《六评白皮书》，改题更明确地呼应整部《选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叙事，宣告“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直揭《选集》重塑民众历史观念的诉求。

前述关键位置的著作，除第二卷与第三卷结尾的著作外，都被编辑者视为重点著作，在《选集》各卷出版的同时，就印制发行单篇本或汇编本。这些有意识被编排在关键位置的著作，皆于中共革命史叙事的完整性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绝大部分关键位置的著作都不局限于具体策略或短暂政策。这也说明，编辑者还希望在历史叙事以外，将《选集》塑造成一部理论色彩更强、彰显领袖魅力的经典。

## 结 语

《选集》之经典意涵并不仅仅体现于作为“内容”的著作文本，亦呈现于作为“形式”的著作编排中。事实上，《选集》的各个编辑环节皆凝聚着编辑者的特殊考量，而著作编排的形式决定着文本内容的呈现方式与解读方向。就历史叙事的形成而言，《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毛泽东著作表述的历史事件，多承袭自此前的革命史著述。正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注入，使同样的历史事件被组织进不同的结构，进而负载不同的历史意义、呈现不同的历史叙事。《选集》的编辑出版，不仅是此前毛泽东著作的汇集再现，而且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叙事的再生产。忽视《选集》的编排、编辑语境及思想资源，仅从毛泽东著作的内容着手，则较难注意到这一面相。同样，单纯从政治史角度说明历史叙事在中共政治史中的效用亦较偏狭，历史叙事的思想资源及其流转实况更难得清晰认知。

《选集》著作编排体例的完整含义是，以时间顺序为编排著作的基本原则，兼以文章主题成组编排著作，且精心布局关键位置的篇目。这一体例关联着中共执政初期革命史叙事的定型。《选集》的编排只有被置入革命史叙事的历史中才可得到更合理的解释，同时，革命史乃至当代中国较长时期里的近代史叙事的流变亦因此而得更完整的理解。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人民日报》1960年9月30日，第1版。

② 40年代下半期，最早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张如心、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均在各自的著述中用“科学预见”描述毛泽东。两人的著作已收入刘统编注《早年毛泽东：传记、史料与回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

③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人民日报》1960年9月30日，第1版。

具体言，《选集》以时序编排著作的做法，遵循苏联版权威经典的体例，亦效法晋冀鲁豫版《选集》的前例。此种文本体例之形成及被《选集》编辑者选择的深层思想动因，则是中共历史叙事的渐趋成熟。中共延安时期高层政治格局的调整，历史叙事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自编辑党书，到学习党史，再到决议历史问题，均是毛泽东自觉构造历史叙事的举措。此前，中共理论家已尝试从社会性质和近代历史中探求中国未来之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则系统回应中国革命的诸种问题，历史叙事更被毛泽东援引为此思想体系的一个支柱。此种理论与现实的双重诉求，使得历史叙事成为中共政治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元素。更进言之，清季以来史学地位的提升与革命史的兴起，为此种政治文化的形成提供背景契机、思想资源，以及发挥效力的观念空间。

此一历史叙事随其地位的提升不断得到完善。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成为中共权威意识形态，辅以党书、决议、革命史教材等等渠道，建国以前已形成成熟的以毛泽东为中心的党史叙事和以中共为中心的中国革命史乃至近代史的历史叙事，并已具备严整的历史分期与命名。此种叙事在建国初期重塑民众历史思想的诉求下，经《选集》和《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两种权威著述吸纳、完善。随着《选集》成为新的经典，经由经典确认的权威革命史叙事亦同步定型，成为新政权形塑新人、巩固执政正当性的基础思想资源。

两种著述的革命史叙事毫无二致，形成经典与史著相互支撑印证的格局。编辑者以主题成组编排著作和精心布置首尾著作，既试图强化其历史叙事，又意欲凸显毛泽东著作的理论色彩。这使得《选集》自身的文本就足以形成经史互证的效应，进而兼有经典与史籍的性质。

(本文作者 北京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博雅博士后 北京 100871)

[责任编辑：侯竹青]